

论云间、常州词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异同

刘 晓

摘 要: 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与清代嘉庆年间兴起的常州词派,都推尊五代、北宋词。理论大旗的一致,使两派具有相通的词学主张:皆倡词有寄托,以达“风骚”之旨;有相似的师法对象,重视“花间”温、韦词。然而,两派差异亦非常明显:在取法风格上,云间词派主宗“婉约”词风,常州词派则推重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浑成”一路;在词论视野上,云间词派不免偏颇狭隘,常州词派则注意兼采众长。两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差异,根本上缘于不同的历史背景、立论情境,以及因处在词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从而导致的不同的认知视野。但它们亦前后相承,端绪相接,共同推助词坛风气向“推尊词体”一路发展,隐约勾勒出明清词坛的嬗变轨迹。

关键词: 云间词派;常州词派;五代、北宋词;接受;明清词坛

作者简介: 刘晓,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清之际‘经世’视域中的文学思想演进研究”(12CZW012)。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8.05.013

明末清初的词坛,地域性词派和词人群体迭起,而一般以云间词派陈子龙为最先发声者,开启清词“三百年来词学中中兴之盛”。云间词派推尊五代、北宋词,这对后来的西泠、广陵、毗陵诸派均产生了直接影响。然而,经浙西词派先驱朱彝尊的倡导,以姜夔、张炎词为代表的南宋词风刮遍词坛。如此一路发展至嘉庆初年,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异军突起,再一次举起宗法五代、北宋词的大旗,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折返”。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从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云间三子”结识并进行唱和的崇祯初期(1628年前后),至张惠言及其弟张琦编辑《词选》的嘉庆二年(1797年)^①,其间近一百七十载,为何常州词派再次提出师法五代、北宋词的主张?在词学复兴伊始和清代词学发展相对成熟的阶段,两派对其认知、接受有何不同?以往研究多对两派分而论之,今合观其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异同,分析其嬗变原因,当对全面认识明清词坛的发展演变有所助益。

一、两派对五代、北宋词之推尊

云间与常州词派皆推尊五代、北宋词,这主要体现在其核心理论主张与师法对象上。

^①事实上,张惠言《词选》在嘉庆年间尚未彰显于世。严迪昌先生认为,常州词派旗号方始大展是在周济一辈,《词选》的影响亦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以后才得到扩大。参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0-472页。

（一）同追“风骚”之旨，主张有所“寄托”

云间、常州两派虽遥隔百年，但同宗五代、北宋词，在追摹“风骚”深意、崇尚“雅正”之风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云间词派出现于明朝末期，龙榆生先生曾这样评价它的词史地位：“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興之盛。”^[1]此时的词坛受词本“小道”“末技”观念的影响，弥漫着空洞淫靡的词风，内容题材单一，大多是“挟春月烟花于闺檐内”的作品，柔弱无骨，失去了真切动人的情感意蕴。陈子龙崇尚南唐、北宋词，其直接意图正是借其自然婉畅、蕴藉浑成之优长纠正当时的颓靡词风，倡导有所寄托的词学观念，承继“风骚”传统。他在《三子诗余·序》中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之作，必托于闺檐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2]47}他认为，传统诗学的“风骚之旨”皆以抒情为旨归，就词来说，可借幽深婉约的闺情小词达到这一目的。因此，他选择了极具婉丽风格和蕴藉风貌的南唐、北宋词。其《幽兰草题词》更明确揭示了这一词学主张：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2]73}

陈子龙认为，无论是“哀艳之情”还是“盼倩之趣”，南唐、北宋词人都可借情景交融、意辞俱足的作品表现出来，且能妙手天成、浑厚高古，这是南宋词所没有的品质。他标举南唐二主、周邦彦、李清照为学词典范，其根本论旨是主张词要言之有物，有情感寄托，回归比兴言情的“风骚”传统。这一主张在其弟子蒋平阶那里得到进一步申述，蒋氏《支机集·序》言：“托情闺阁，尽后庭玉树之悲；寄傲蓬壶，即九鼎龙髯之墓。”^{[3]246}蒋平阶身处明亡之际，其借闺阁之词抒发亡国之悲，寄意更加绵邈凄恻。对寄托已意的强调，是云间词派面临词坛弊端并结合个体身世遭遇所提出的应时主张。

而接续“风骚”、词有“寄托”的这一追求，亦是常州词派所标榜的。与云间词派针对明代词坛的空洞无物发论不同，常州词派所批判的是浙西末流徒追形式的雕琢之风。与浙西词派针锋相对，常州词派追求作品的内涵意蕴和浑厚天成之势，五代、北宋词再次被发掘、宗法。他们首先关注的，也是五代、北宋词在接续“风骚”旨趣上的优长。如周济曾这样标榜张惠言的开创之功：“开辟榛莽，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一时作者竞出”^[4]，直接指出常州词派的创作与理论追求正是上接“风骚”传统，重振以温、韦、周、辛为代表的词风面貌。此处所列，除辛弃疾外皆是五代、北宋词家，这便与云间词派的理论主张有了相通之处。此外，张惠言亦明确提出该派词论的核心观点——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张惠言《词选·序》言：“《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5]7}在这段话中，核心语词便是“意内言外”，即语言构筑起作品的骨架，意义则是填充其中的血肉。意义并不是凭空赋予，而是缘于作者幽约怨悱、不得不遣的充裕情感。表面上，词表达的是“里巷男女哀乐”；然于内里，词却是别有寄托的，这是小词要眇宜修、曲折幽隐美学特质的来源。基于这种认识，张惠言

引诗歌的比兴传统入于词论,言“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5]7}。运用比兴,更像是张氏提出的学词门径,最终达到有所寄托、追步“风骚”的词学境界。因而,常州词派的理论核心是推崇“意格”,强调作品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反对片面追求技巧和雕饰辞采。

由此可知,云间、常州词派皆尚词有“寄托”,以达“风骚”之旨,且都拈出五代、北宋词作为推尊对象。这是他们在核心理论上的共通之处。只是,在词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云间词派和常州词派在理论构建的完整性和鲜明性方面是不同的。相较而言,常州词派的词学主张更具系统性,何为“寄托”,如何“比兴”,何为“意内言外”,都有前后相承、愈发完善的体系特征。

(二) 同从“花间”入,师法温、韦词

既在核心理论主张上有所共通,两派在具体师法的词家上,亦有相似与重合。其中显著的,便是皆推崇五代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的花间词人^①。

宋人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曾言长短句“大抵以《花间集》中所载为宗”^[6]。作为明末清初词坛上发轫较早的词学派别,云间词派对“花间词风”颇为关注。陈子龙早期学词摹写《花间集》,受温庭筠写词技法的影响颇深,所尚乃是婉丽纤秣的词风。据学者统计,陈词不过七十余首,其中五十多首连续使用“红”“香”“锦”“金”等既有色香、又有质感的形容词,“使得其词亦如温词,具有类似工艺品的装饰性特征”^[7]。温词以富丽精工为特色,后人对陈子龙创作的评价亦多“丽”字。如王士禛《花草蒙拾》云:“陈大樽诗首尾温丽,湘真词亦然。”^{[8]685}吴旦《兰皋集》云:“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9]这些评价可谓中肯,是花间词风在云间词人创作中遗存的证据。至蒋平阶,其词亦仿花间,尤其更像简洁疏朗的韦庄词。此外,云间词派其他词人的词风也酷似花间,如徐珂《近词丛话》评宋征舆“其词不减冯、韦”,评李雯词“语多哀艳,逼近温、韦”^{[8]4222}。由此可见,云间词人以其创作实践,体现了他们对以温、韦为代表的花间词风的推崇。不过,如上文所及,陈子龙中晚期受李后主影响至深。这既缘于其国破家亡的相似遭遇,亦因他对早期所尚花间词雕琢词句之弊端的体认,因而后期词作更多了些凄怨激楚之韵,少了些婉妍柔绵的格调。只可惜这位云间开派宗主英年早逝,“词风正渐见变异”之时便以身殉国,无怪乎严迪昌先生感慨:“惜乎广陵散绝,云间一脉经时代陶铸而成就的真正宗风,从此后继乏人矣。”^{[10]17}

至于常州词派,更直接标举温庭筠为学词典范。张惠言《词选·序》云:“自唐之词人,李白为首。……而温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闳约。”^{[5]7}这里的“深美闳约”,是将温词的宏丽富赡看作有所寄托的曲折深婉之作,以此明确对作品“意格”而非外在形式的追求。《词选》一百一十六首作品中,选温庭筠词独多(十八首),表明了张氏对温词婉丽蕴藉风格的偏爱。而对其他五代词人,如以孟昶为首的西蜀词和以李璟、李煜父子为首的南唐词,张氏则目其为“词之杂流”,认为“五代之际,孟氏、李氏君臣为谑,竞作新调,词之杂流,由此起矣。”不过他并未全盘否定南唐、西蜀词,补充言道:“至其工者,往往绝伦。”^{[5]7-8}至常州词派的另一主将周济,受张惠言影响,亦以温庭筠为词家极诣。他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云:

①两派对北宋词家的选择,可详下文。

皋文曰：“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信然。飞卿酝酿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懣，备刚柔之气。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如飞卿则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11]5}

由此可见，周济着眼于温词的蕴藉、密丽，乃至“浑厚气象”，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且，周济对张惠言的“词统”观进行了一些修正。一方面他继承了张氏的“正变论”，将温、韦、冯等人列入正声之流，将李煜等人列入变声之流，即“《词辨》十卷，一卷起飞卿为正，二卷起南唐后主为变”^{[8]1636}；另一方面，他并没有以“杂流”来称呼南唐词，而谓“南唐后主以下……抑亦正声之次也”，“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漓矣，然犹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8]1637}。在他看来，李煜所代表的南唐词虽未比温、韦词温柔敦厚，但亦是“正声之次”。由此可见，周济对五代词的体认更加全面系统。

这里稍可申论的是，两派在效仿花间词的初衷、后期认识的发展以及总体词风体认上实际有所不同。花间词以闺阁女子的情思春愁为主要题材，依托歌儿舞女的歌唱方式得以传播，这是词在早期兴起的主要特色。云间词派受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在论词上亦受此观念波及，他们打着复“花间词”之古的旗号，其实是复“歌妓传统”之古^[12]，这在某种程度上为其取法门径的狭隘化埋下了隐患。至蒋平阶的《支机集》，云间词人直接摒去北宋词而专事五代词。如沈亿年在《支机集·凡例》中言：“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3]245}这种“冀复古音”的论调，阻断了云间词派取法北宋诸家之长、汲取创作养分的进程，仅以五代词作为廓清明代淫哇词风的依托，不免狭隘。与云间词派相比，早期的常州词派更看重花间词的“潜义幽隐”，如张惠言往往“以经学家的手法来探词的‘微言大义’，笺释温飞卿词的‘义有幽隐’之处”^{[10]475}。不过至周济提出以周邦彦为学词典范时，常州词派已经认识到花间词的弊端，并试图纠正张惠言对五代词的过度阐释，在综合考量晚唐五代至南宋词的基础上，提出效法更加浑成的清真词之主张。这是与云间词派起点相似、落脚点却不同的差别所在。

二、两派对五代、北宋词接受之差异

虽然都推尊五代、北宋词，但近一百七十年的时间跨度，足以使处在词学振兴初创阶段的云间词派与词学发展相对成熟时期的常州词派，产生不同的体认水平与宗法风格，故两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状况存在极大差异。

（一）宗法风格：“婉约”与“浑成”

首先，在对待北宋词的态度方面，两派表现出不同的取法倾向。云间词派主要宗法“婉约”一路，常州词派则标举以周邦彦为代表的“浑成”一路。云间词派尚婉丽。陈子龙曾言：“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2]47}可见，陈氏对北宋词的婉畅秾逸尤为关注。如果细加寻绎，我们会发现云间词派对北宋词家的推举，很大程度上限于以晏殊、欧阳修、李清照、秦观等人为代表的婉约一派，其对苏轼等豪放一派的评论却少之又少，这是与常州词派大为不同的一

点。陈子龙偶有提及苏轼,不过是将苏词与柳词并置(“元美取境似酌苏柳间”^{[2]73}),而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区分体认态度。云间词人宋征璧曾言:“吾于宋词得七人焉,曰永叔,其词秀逸。曰子瞻,其词放诞。曰少游,其词清华。曰子野,其词娟洁。曰方回,其词新鲜。曰小山,其词聪俊。曰易安,其词妍婉。”^{[13]88}这里列出欧阳修、苏轼、秦观、张先、贺铸、晏几道、李清照等七人,除苏轼外,都是传统词学观念中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苏轼以后的豪放词人代表辛弃疾,宋征璧则直接指出其弊端:“辛稼轩之豪爽,而或伤于霸”^{[13]88},意谓辛词豪放过处有种不恰当的“霸气”。而对常州词派极为推重的清真词,宋征璧也有所不满,认为“周清真蜿蜒流美,而乏陡健”^{[13]88}。在他看来,周邦彦的词缺少健峭之美。因此,从对北宋词家的选择来看,云间词派对北宋词的取法是有所侧重和偏爱的,主宗婉约词风。

与此相对,常州词派对北宋词的风格体认与取法,则更加全面、深广,并不局限婉约一派。张惠言《词选·序》言:“宋之词家,号为极盛,然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渊渊乎文有其质焉。”^{[5]8}张氏所列,不仅有北宋词人,亦有南宋词人;而于北宋词人中,不仅有婉约风格的张先、秦观,亦有豪放风格的苏轼;最重要的是,其中有不为宋征璧看好的北宋词人——周邦彦。周邦彦被常州词派视为学词的最高典范,不是因为他代表了婉约或豪放中的哪一派风格,而是因为他吸收北宋诸家之长,又化出南宋诸家之体,即周济所说的“清真集大成者也”^{[8]1643}。若非要说某一种风格,那应该就是“浑成”一路了。常州词派后学陈廷焯的评价最具代表性:“词至美成,乃有大宗。前收苏、秦之终,后开姜、史之始,自有词人以来,不得不推为巨擘。后之为词者,亦难出其范围。”^{[8]3787}这段话从周邦彦之前、之后的整个宋代词史观照清真词地位,其考量应该是全面的。而就周济来说,他也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学习、揣摩、思考过程,才奉清真词为创作典范的,其早年并不喜欢清真词。《词辨·序》云:“余不喜清真,而晋卿(董士锡)推其沉著拗怒,比之少陵。”^{[8]1637}后来经过与友人的相互切磋,周济改变了对周邦彦词的看法,“遂笃好清真”,并将“集大成”的称号冠于周邦彦。一方面,周邦彦以思力安排勾勒、驱词遣句,却终能以人工追自然,使慢词长调亦如晚唐五代的歌咏小词一样,幽深要眇;另一方面,周词也不乏苏词的“言志”之心,却又比苏词更加蕴藉沉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如此,只能以“浑成”比拟了。周济的选择,既是基于对南北宋词的全面体认,亦是为避免重蹈浙西词派之“覆辙”。他在批判浙西词派时直接而果断:“一若文人学士清雅闲放之制作,惟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惟姜、张为山斗。呜呼,何其陋也!”^[14]独尊一体必然会导致词坛的“千躯同面,千面同声”,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周济将“集大成”的周邦彦推尊为常州词派师法的代表人物,倡导清真词“集大成”之特点。这种眼光也是云间词派所缺乏的。

(二) 词论视野: 偏狭与广深

由以上对北宋词的体认及师法已可看出,云间词派与常州词派的词论视野有偏狭与广深之异。这种差别,还集中表现在他们对南宋词的态度上。论述两派对五代、北宋词的接受差异,不可完全抛开其对南宋词之体认,因为自云间词派开始,便有了贯穿清代词学史的南北宋之争^①,

^①清代词学中的南北宋之争,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论题,具体论述参见孙克强《清代词学的南北宋之争》,《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第127-136页。

诸派对南北宋词的态度本就一体两面。先是云间词派标举南唐、北宋词，抑黜南宋词；后浙西词派倡导以姜、张为代表的南宋词，词坛遂又弥漫南宋词风；至常州词派兴起，复又推重北宋词。南北宋之争，贯穿于整个词风演变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从词风体认，还是从立论情境来看，两派对五代、北宋词的师法，都避不开对南宋词的态度，故而我们单独列出加以考察，借以窥探两派相似旗帜下的一大不同。

云间词人陈子龙在《幽兰草题词》中这样评价南宋词：“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2]73}这里的“此声遂渺”，指的是南宋词缺乏北宋词“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的“高浑”之相。陈子龙特拈出两类词风加以批判：一类是粗疏草率之词，一类是鄙俗浅陋之词。从中可知，陈氏斥责的是南宋词缺乏蕴藉温丽、古雅浑成之美的弊端。这一评判显然以偏概全、因噎废食，“伧武”“鄙浅”并不能对南宋词一言以蔽之，陈子龙对南宋词的态度不免失之偏颇。这一观点被云间词派后期论者所继承。如宋征璧所推举的七位宋代词人皆是北宋人，无一南宋人。他认为“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13]89}。所谓“繁”，是指摘南宋词雕琢辞句、缺少自然简率的特点；而“弊”则是相对北宋词之“盛”而言，其抑黜南宋词的态度显露无疑。后至蒋平阶那里，则更以严厉之态“屏去宋调”，南宋词愈加没有立足之地了。

那么，常州词派对南宋词又持何种态度呢？一般来说，因常州词派批判的对象是宗法南宋词的浙西词派，它应该更加激烈地反对南宋词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张惠言是不持此论的。一般认为，张惠言是常州词派开宗立派的领袖，后世常州派词学家也推尊张氏为本派宗主^[15]。但实际上，“常州词派的旗号只是到了周济这一辈方始大展”^{[10]472}，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张惠言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宗法南宋词的浙西词派。他在《词选·序》中将宋代词家分成两类：一类是“渊渊乎文有其质”的词人，如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另一类是“荡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的词人，如柳永、黄庭坚、刘过、吴文英。这些词人之中，第一类是得到张惠言高度赞扬、可以之为师的，第二类则是各有其长、需加甄别的。不论如何，浙西词派所推重的姜夔、张炎二人被列入第一类，可见张惠言对代表南宋词风的姜、张二人并无抵牾。而周济不同于张惠言，他对姜、张是持否定态度的。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云：“白石词如明七子诗，看是高格响调，不耐人细思。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11]8-9}从这些论述可知，周济认为姜、张二人的缺点都在于意尽言内，门径浅狭而缺乏蕴藉之味，不耐人细思咀嚼，这可谓是与浙西词派持论两端。不过即使在这种批判立场上，他也未对南宋词人采取全部摒弃的态度。他在贯彻“比兴寄托”说的主张时，是兼取南、北宋词人之长的，这集中体现于他在《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提出的“词统论”。他主张，学词要“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8]1643}，意谓先学习王沂孙词的深寓寄托，再学习吴文英词的奇思壮采，继而效仿辛弃疾词的慷慨悲歌、家国之情，最后达到周邦彦词的“浑化”，褪去一切技巧装饰。这样由浅而深、由入到出、由近至远排列，最终旨归虽是达到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北宋词境界，但由南宋词入其门径，体现出周济兼采众家之长、不偏狭束缚的词学观。在此之前，无论是云间词派宗南唐，阳羨词派推辛弃疾，还是浙西词派倡姜、张，

其词论视野都存在某种程度的狭隘,常州词派这种广而深的词论主张,是云间词派所未有的。

三、两派对五代、北宋词接受差异的原因分析

云间词派与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其一致性在于恢复以五代、北宋词为代表的典雅蕴藉、有所寄托的词学传统,然而却因诸多因素又导致它们在取法重点、师法风格以及词论视野等方面存在差异。综而观之,其接受差异的原因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两派所处的历史背景不同。云间词派处在明末清初,面对朝代兴替,陈子龙、蒋平阶等人都饱含亡国之悲,又因清朝初年的政治高压,不能直接表达内心所感,所以当发现五代、北宋词中的小令具有幽深曲隐的美学特质时,便欲以此寄寓心迹。词之美感的发现与个人身世的遭遇相互碰撞,加上“这种心境与五代词人,特别是李后主相近。所以他们只取唐五代,而不取歌舞升平的北宋词”^[16]。这应该是云间词派后期以蒋平阶、沈亿年为代表的词人专事南唐五代词、摒去宋调的原因之一。而常州词派处在乾嘉之际,“康乾盛世”已成过往,朝政黑暗,国势衰颓,嘉庆朝更是积重难返,社会动荡加剧。这种现状无疑对知识分子造成巨大刺激,“康乾盛世”时期风靡词坛的清空、雅正之风,已与士人经历社会变迁和身世变化后的情感郁愤不相适应,故常州词派有意纠正浙派的清雅之路,转而推重深婉蕴藉的感怀之风。早期的张惠言看重温庭筠词的“深美闳约”“微言大义”,到周济则有意避免花间词弊端,进一步尊崇意辞俱足、集唐宋词之大成的清真词为典范。从这个角度讲,云间词派更青睐有亡国之悲的南唐五代词,常州词派则更推重蕴藉浑成的清真词,历史背景的不同是导致两派取法重点相异的原因之一。

其次,两派具有不同的反拨对象和立论情境。每个词派的兴起,往往是在与稍前或同时词派的砥砺、切磋,甚至对抗过程中,确立本派主张与特色的。云间词派主要师法五代、北宋词婉丽纤秣一路,其初衷是纠正明词淫哇习气,主张有所寄托。但他们终究无法完全割断明词余绪,在实际创作中仍偏爱婉约幽深的闺阁小词,于北宋词人中也更青睐张先、秦观、李清照等婉约词人,这在词学振兴初期无疑具有推尊词体、宣扬“词别是一家”的意味。常州词派兴起于清代中期,此时的词坛经过各大词派的纷争,已经确立起词趋雅化的不争事实。它的反拨对象主要是浙西词派末流在师法姜、张词的过程中流于形式,过分注重人工雕琢而忽视自然天成的弊端。因此,常州词派的立论重点是强调比兴寄托、辞美意足,在综合考量唐宋词的基础上,倡导深厚浑成的清真词风。要言之,云间词派师法婉约风格,其意在于一扫颓靡词风,恢复词之“本色”;常州词派师法浑成风格,其意在于深知各家长短,推出最高学习典范,以纠正浙西词风。

最后,两派处在明清词坛发展的不同阶段。云间词派处在“宗风大振”的词学复兴初期,常州词派则处于中兴之盛的成熟时期,这是造成他们对五代、北宋词接受视野偏狭与广深之异的最主要原因。清代刘体仁曾以唐诗的划分方法来论词,认为“词亦有初、盛、中、晚,不以代也”^{[13]85},并以盛唐诗比北宋词。受其启发,我们或可这样来认识唐宋词:“花间”之于词,犹如齐梁诗之于近体诗,重声律词藻,处于形式层面的确立成熟阶段;而后经过李后主等人的开拓,词为之一变,开始注重蕴藉意态,同时为北宋词的自然天成蓄积能量;顺之而下,至北宋,词体

粲然绽放光彩，犹如盛唐诗一般夺目，圆润丰腴、蕴藉典雅，既有丰富的情韵，又具协律可歌的形式；而南渡之后，词便犹如中唐诗，求奇求备，注重学习的方法门径，虽万法俱备，却独独少了几分自然蕴藉^①。对五代及南北宋词风，陈子龙缺乏这种认识。他要反对明末词坛空洞淫靡的风气，却又难脱其影响，只着眼于藻饰华丽的花间小词，后期虽转向更为典雅的李后主词，但所学范围终不免狭窄，没有综观词史的视野，对北宋词的体认并不深刻。云间词派虽看中了北宋词的“意格”，却没有足够的后劲去拓深，以至于陈子龙之后，云间词派愈发走向狭隘一路，最后陷入只师法五代词的窠臼。常州词派处在清代词学发展的成熟期，之前百年有余的词坛论争已使人们对南、北宋词的风格特点有了较为完整、客观的体认，故而，常州词派是拥有立足词史、考量词史的眼光和功底的。尤其至周济，他从张惠言处接过词派大旗，进一步完善了词派理论，跳出只师法温庭筠的小圈子，提出历南宋词溯游而上，最后达到清真词“浑成”境界的主张。他针对的是浙西末流学词的不良之风——略“意”而重“技”，这往往是某一文学体裁发展高峰过后学习者最容易落入的误区。正因此，常州词派推举周邦彦为最高学习典范，主张词要达到意辞俱备、技巧圆熟、无迹可寻的水准。在重视“意格”和“寄托”的层面，周济的主张虽然与陈子龙相似，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周济所着眼的，不是在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下倡导的某种词风，而是在全面考量词史的基础上抽绎出的学词经验，对词之批评、创作皆具指导作用。

四、结语

要而言之，云间、常州两派都推尊五代、北宋词，理论大旗的一致，导致两派在词学主张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同追“风骚”旨意、同习花间词风等。但词学发展实际的差异，亦使两派存在诸多不同，如师法风格的婉约、浑成之异，词论视野的偏狭、广深之别等。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种差异缘于两派不同的历史背景、立论情境以及处在词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也需注意到两派的一脉相承之处。处在词学复兴初期的云间词派，推尊五代、北宋词，抑黜南宋词的主张虽有偏颇之嫌，但其对南唐、北宋词的倡导、体认，对宗法北宋词之风气的开启，于常州词派是有深远影响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两派前后相承、端绪相接，共同推助词坛风气朝“推尊词体”一路发展，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词体、词风愈发全面的认知，隐约勾勒出明清词坛的嬗变轨迹。

参考文献：

- [1] 龙榆生. 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 [2] 陈子龙. 安雅堂稿 [M]. 孙启治，校点.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 [3] 蒋平阶. 支机集 [M] // 《词学》编辑委员会. 词学：第2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 [4] 周济. 存审轩词·自序 [M] //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3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6.
- [5] 张惠言. 词选 [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①类似说法，还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五：“以词较诗，唐犹汉魏，五代犹两晋六朝，两宋犹三唐，元明犹两宋，国朝词亦犹国朝之诗也。”参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903页。

- [6] 李之仪. 姑溪居士全集: 40 [M]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310.
- [7] 陈水云. 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传播与接受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71.
- [8] 唐圭璋. 词话丛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9] 沈雄. 古今词话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55.
- [10] 严迪昌. 清词史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 [11] 周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 [M]. 顾学颉, 校点.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 [12] 张宏生. 清词探微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51.
- [13] 徐钊. 词苑丛谈 [M]. 唐圭璋,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4] 周济. 止庵遗集 [M] //《常州先哲遗书》整理编纂委员会. 常州先哲遗书后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1.
- [15] 孙克强. 周济词学思想的变化与常州词派理论的完善 [J]. 中国文学研究, 2007 (2): 246-263.
- [16] 孙克强. 试论云间派的词论及其在词论史上的地位 [J]. 中州学刊, 1998 (4): 91-96.

Yunjian and Changzhou Ci School's Different Reception of Ci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Liu Xiao

Abstract: Yunjian and Changzhou Ci School, active respectively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Jiaqing Empire of the Qing Dynasty, both think highly of the Ci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imilar theoretical foundation means similar propositions. They both advocate “coquettish” works, worship similar models, and value Huajian authors such as Wen Tingyun and Wei Zhuang. However, differences also exist between these two schools. Yunjian Ci School prefers the genre of “delicate restraint” while Changzhou Ci Schoo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the genre of “refined integr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i criticism, Yunjian Ci School has narrower critical views than that of Changzhou Ci School with the latter tending to gather various good qualities. These reception discrepancies are due to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rising contexts and developing phases of Ci-ology which bring about different cognitive perspectives. They are in succession. They both promote Ci to a “respectable” style and, to some degree, reveal the evolution route of the circle of C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Yunjian Ci school; Changzhou Ci school; Ci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ception; the circle of Ci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收稿日期: 2018-01-06; 责任编辑: 陈鸿)